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上海奋斗之路

干部“沉下去”为民办实事,杨浦区在摸索中形成一套完整工作体系,以制度化回应时代之需

老工业区走出的“一线工作法”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周渊

从老工业城区转变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大杨浦”的城市治理呈现出罕见的复杂和多变。不过,70年来,杨浦从老工业区奔向创新之城的脚步中,始终不变的是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

上世纪50年代,工人新村里有了干部“劳动日”

1950年,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工人新村,便是体现当时“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市政建设方针的产物。

1952年4月,市政府设立上海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在全市统筹兴建二万户工人住宅,俗称“两万户”,其中有一万户建在杨浦——这是杨浦地区首批工人新村住宅。区内大型企业此后也以此为标准建造了一批职工住宅,它们共同构成杨浦工人新村板块,也是上海最大的工人聚居区之一。

工人新村多在工厂附近,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在互帮互助、人情味浓郁的生活氛围中构建起初代社区概念。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是一种身份的荣光,而新村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将“主人翁”概念落实为具体感受,比如建立起“家属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让工人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

政府机构和各级干部也从其中摸索着基层工作方法。上世纪50年代,机关干部就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进行调查,1958年,区里制定了干部必须参加劳动的制度,两年后设立了每周四为干部“劳动日”。一位老居民还记得,当时区长就曾到厂里和大家一起劳动,倾听群众意见。

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社会形态的快速变化,杨浦区进一步明确了机关干部一年两次下基层为群众办实事的制度,每次至少一周,时间固定在春节前和高温时节。到1990年的七年间,下基层的机关干部达到3000余人次,他们深入一线倾听群众意见,落实排忧解难措施,先后帮助基层解决市场供应、子女入托入学、住房维修、



1972年的“工人新村”中凤城新村的三层住宅楼。(资料照片) 俯瞰如今的上海百年水厂杨树浦水厂和东方渔人码头。 袁婧 朱良城摄



▲上世纪80年代的杨浦区航拍影像。(资料照片)

汛期积水、窨井堵塞、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问题。区政府也根据群众热点、难点进一步组织了专项调查,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解决了菜场副食品供应、新村商业网点、棚户危房和严重积水地区改造等问题,缓解了一部分突出矛盾。

一线工作法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这种从群众需求出发、干部深入一线解决问题的基因在“大杨浦”的发展转型中不断更迭创新。

2003年,随着“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转型大幕拉开,杨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国有企业从1200家锐减到200家,各类社会救助对象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一,二级以下旧里和棚户区占全市1/4,迫切需要上级党组织回应群众诉求;与此同时,一批机关干部遇到“本领恐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

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的“三门干部”。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浦区于2005年推出“一线工作法”,汇总形成一套完整的“知民情、解民忧、聚民智、听民意”工作体系,以制度化回应时代之需。

2005年,时任杨浦区审计局副局长李阳放第一次走进有“穷街”之称的定海街道沈家滩居委会联系群众,当时居民们“逢雨看海”的景象还未改变,她是蹚水进的居委会。居民们还反映,汛期家里的积水甚至超过膝盖。这一幕场景令她终身难忘。她说:“原来看到的审计数字都觉得是枯燥、冰冷的,现在再看这些数字,背后都是群众的疾苦。”

正是从那时起,“一线工作法”始终把百姓冷暖系心头,展现了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它用十多年来不断完善、优化,畅通了干部联系群众的六条渠道,实现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定

时定点人直面对群众,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范围全面拓展,形成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覆盖群众需求,让百万群众受益。

亲身参与其中的杨浦区干部们对此深有感触。他们认为,“一线工作法”,强调的是“今天能尽的职责不拖到明天,把好事办实事在群众开口前”,像一条纽带紧紧系起党组织和群众。

“两万户”旧改14年,一线工作法再促机制创新

行至今日,在工人新村集聚的“大杨浦”,最大的民生工程又一次聚焦群众的居住条件改善——旧改,就是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面对庞大的旧改体量,发挥旧区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活力和创造性至关重要,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的“一线工作法”让旧

改成果惠及更多老百姓。

让杨浦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是长白新村街道228街坊——这里就属于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两万户”。历经近70年风雨,这里的居住环境已经异常艰苦,但受制于种种条件,它的动拆迁史长达14年。2016年7月,作为“老大难”的长白新村228街坊,以杨浦区首创的“三个100%”新模式成功旧改,仅用了3个月,让最后360户居民圆了苦盼多年的搬迁梦。

“三个100%”,即意愿征询率、协商签约率、整体搬迁率均须达到100%。听上去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白新村以“整体协商搬迁”化解。

街道干部首先组成了工作小组,进驻动迁基地一线办公,街道搭建起一个公信平台,由街道干部、居委会干部、居民代表、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民警、律师等组成,专门协调228地块动迁中

的各类矛盾。除了开政策宣讲会,街道和居委干部分片包干,一户户走访摸底。当时的街道调研员黄才友记得,工作组给每一户都制作了一张情况表,将家庭成员关系,可能涉及的矛盾等一一列清。这一创新的旧改模式,背后是党员干部想方设法找突破,也是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克难的结果。

今年初,杨浦区立下打赢旧改攻坚战“旗帜”:完成旧改征收7000户、收尾6个基地。农历新年刚过,已有好消息传来——江浦街道160街坊基地顺利通过旧改“一次征询”,千余户“蜗居”居民有望尽早告别“拎马桶”的日子。基地规模不算大,但对未来一段时间杨浦旧改工作意义重大——杨浦区正计划在此探索市区联手推进旧改的新机制。而这一个创新举措,也是杨浦区适应新时代,依靠“一线工作”精神,解决问题、服务百姓的一个例证。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首届“绿色长三角”论坛上,专家认为江南水乡平面水网的特性给公共治理带来灵感

绿色长三角需要更多“横向动力”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在我国,治水常常能为公共治理带来灵感。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日前在上海举办首届“绿色长三角”论坛,与会专家认为,长三角生态环境一体化需要创新机制、注入新动力——这就如同江南水乡,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提升水动力、让水“活”起来。长三角一体化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加速期,生态环境是极为重要的一体化领域。但作为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的环境承载力与安全状况也与经济发展存在较突出的矛盾。以上海为例,城市四周几乎全是生态敏感区。用同济大学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演讲中的话说,上海周边的地理空间态势,就是北“岛”(崇明)、东“滩”(长

江口及沿海)、南“湾”(杭州湾)、西“湖”(淀山湖太湖)。对于这些区域,上海有很高的生态期待,但越过了省界,却往往遭遇到当地密集的产业布点。因此,长三角生态环境一体化,就更加强调跨行政区域的协同一致。

那么,什么力量能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诸大建的一位博士生曾对此做过细致研究,按照过去10年的实际效果排序,结论是:行政>法律>人事>市场。也就是说,近十年间,行政力量的主导一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重要的模式。但诸大建认为,这种动力机制需要调整。

“长三角不是京津冀,也区别于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推进必须要有自己的机制。”诸大建认为,长三角或许不会有那么多自上而下的“垂直干预”,因此就需要创造出更多“横向”的、“自下而上”的一体化推进模式。

这种局面,与长三角河网本身因为地势平坦、水体流动性不强,造成活水不足、治水难度较大,是不是有几分相似?

论坛上,治水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在谈及长三角环境治理时,也强调了“重构动力”的重要性。去年,首届进博会前,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水域进行了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张建云是牵头人。但他表示,进博会治水,目前主要靠“原位净化”,是短期之举;长期来看,必须遵循“流水不腐”的原则,为展馆周边水系辟出新河道,创造水动力,从而引入外圈清水,从而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一治水之道,对长三角有何启迪?诸大建说,长三角生态环境一体化,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从而构建出横向的动力

机制。

在政府层面,长三角生态合作,不能只有环保部门的联手。可以说,如果把绿色发展当成一场足球比赛,那么环保部门只是“守门员”。诸大建说,长三角需要拓宽政府合作的界面,告别“末端规划”,对区域发展模式进行协同规划,对产业结构、城镇化布局、交通规划等作一体化考虑。

此外,要注重引入市场机制,特别是树立生态资本的理念,以生态资本增值为标尺,设计生态补偿机制,让“下游补偿上游”“未来补偿当下”。诸大建建议,长三角应该利用生态补偿和社会捐助资金,设立“绿色发展基金”,不仅可以用于生态环境治理中,纾缓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阵痛”,也能更好地调动企业、社会的力量,从而使长三角生态环境一体化能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

上海多措并举筹措租赁房源

本报讯(记者史博臻)上海正着眼于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补上租赁住房短板。今年上海再提新目标:推进租赁住房建设形成有效供应,引导和培育建设高品质租赁住房。全年计划新建和转化租赁房源10万套,新增代理经租房源9万套。今年以来,上海已完成新建和转化租赁房源9517套,新增代理经租房源约4万套,不断加强租赁住房建设力度。

拥有四栋高层的闵行浦江生活广场,是上海城旗下最新的租赁住房项目之一,能供应租赁房源千余套,主打30-60平方米户型。房间内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租户可拎包入住。自启动招租以来,看房者络绎不绝。与其他改建的租赁住房项目不同,这是上海成功转换土地性质的项目——由原本的商办用地,转换为租赁住房用地。

追寻红色足迹 讴歌行进伟业

上海教育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巡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张鹏 通讯员焦菁)“红色的足迹,行进的伟业——上海市教育系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巡展”昨天在同济大学拉开序幕。本次巡展包括“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和“遵义会议,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展览”两部分。本次活动将在全市九所高校巡展,持续至10月底。开幕式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和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联作了主题讲座,为同济大学300余名师生代表送上一道“精神大餐”。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今年还将继续举办“给00后讲讲共和国”演讲展示活动、“我和我的祖国”高校网络拉歌、“我和共和国共奋进”主题征集、“70年70人——行进中的上海教育”典型人物宣传以及“齐唱国歌、演绎校歌”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

积极开拓长三角网络安全朋友圈

沪苏浙联动,首席安全官高峰论坛在杭州举办

本报杭州4月21日专电(驻浙记者蒋萍 通讯员刘海波)随着“互联网+”“两化融合”等战略的不断推进,众多传统行业逐步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信息社会已经进入万物互联时代,网络安全威胁和新型病毒风险亦日益突出。如何保障并提升网络信息安全,为企业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成为网络信息领域的课题和使命。“安全:赋能数字新时代CSO首席安全官高峰论坛”今天在杭州举办,沪苏浙网信部门首次区域联动,2019第五届首席安全官评选活动同时启动。

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席安全官制度于2015年在上海率先推行,创新提出了通过聘请具有丰富网络安全管理经验的人士担任首席安全官,已进一步压实各单位网络安全主体责任,统筹推进网络安全规划、建设、运维等各项工作。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特别是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单位,通过设立首席安全官成功应对了诸多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可以说,首席安全官们已经成为奋战在网络工作最前沿的指挥官,是网信人才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同时,经过

近几年的探索,首席安全官评选活动已逐渐形成了内部挖掘、社会推荐、集中评选为一体的综合评价体系,发现并聚集了一大批网络安全精英人士。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委网信办积极开拓长三角网络安全朋友圈,试点搭建长三角网络安全领域精英交流平台,推动长三角网络安全工作一体化发展。

浙江省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将和上海进行紧密合作,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单位要建立首席安全官制度,要网络安全安全官参与到企业运行维护当中来,发挥首席安全官在网络安全当中的重要作用。江

苏省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苏308万公里光缆,居全国之首,网民数量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4个百分点。2000多家互联网企业,200多家网络安全企业。如此大规模的资源,把网络安全守住了,江苏才能顺利从互联网大省迈向互联网强省。

本届论坛由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浙江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江苏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浙江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主办,CSO首席安全官俱乐部、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



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驻沪海军日前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上海各界人士和市民代表走进百年吴淞军港,登上停靠在海军港码头的贺兰山舰和三门峡舰,观看展览,聆听讲解,深入了解我国海军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状。本报记者 袁婧 通讯员 刘勇摄影报道